

## 五四民主、科學革新中的中正之道—— 由李玉階對民主自由及宗教科學之實踐談起

黃 崇 修\*

### 摘 要

本文以李玉階參與五四運動、華山修煉、復刊《自立晚報》、創辦天帝教等四時期為探討主軸。首先，筆者考證了李玉階於上海擔任五四學聯幹部時，秉持何種態度以面對整個學生運動之推進。其次，筆者再以李玉階華山時期所提倡心物一元二用論觀點，對照他《自立晚報》時期，試圖消解民主、極權對立，強調精神、物質共存之調和姿態。繼而透視李玉階八十歲創辦天帝教之後，其人道天道兼修的教化方針。最後，本文歸結李玉階五四時期感性與理性合度、華山時期心物一元二用論、《自立晚報》時期的體制內改革、天帝教時期的人道天道兼修，以說明涵靜老人確實成功實踐了中國儒道思想核心——中正之道，並且以此做為其入世應世之不變法則。

**關鍵詞：**李玉階、五四運動、中正之道、三民主義、自立晚報、雷震案

---

\* 國立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專任副教授

投稿日期：2019.06.11；最後修訂日期：2019.09.08；接受刊登日期：2019.09.25

中央大學人文學報 第六十七期

## 前言

五四學生運動始於北京而開花於上海。根據周策縱及陳曾燾說法，五四於北京爆發後，當時北洋政府開始逮捕相關學生，並且禁止街頭運動或演講，於是在北洋政府嚴密控管下，由英法租界等外國勢力主導之上海，一時成為全國五四運動的領導中心，<sup>1</sup>而當時扮演整個上海五四運動運作核心組織，就是上海學生聯合會。<sup>2</sup>因此就整體歷史發展過程來看，真正導致上海五四運動成功，乃至最後影響北洋政府拒簽不平等條約的關鍵人物，就是當初擔任上海學聯會幾位核心幹部學生，而李玉階先生便是其中活躍於學聯會之一員。<sup>3</sup>

<sup>1</sup> 參照周策縱著，楊默夫譯，《五四運動史》（臺北：龍田出版社，1981年）第五章，頁197-98。及陳曾燾著，張玉法譯，《五四運動在上海》（臺北：經世書局，1981年）第四章，頁85。

<sup>2</sup> 根據陳曾燾說法：「五月八日這天，上海的各個學院、大學、中學紛紛組織起來，作積極的行動表現；在所有高等學府中，復旦大學又是揭竿的先驅者。復旦大學是當時上海擁有最多自由風氣和政治氣氛的學校，傳統上和國民黨保持著密切聯繫。許多學生深受自由風氣薰染，具有強烈的政治意識。當邵力子教授將五四的消息帶到學校後，復旦的學生在五月八日的早上，召集上海所有學校的學生代表，共同討論學生支持運動的種種表現。……鑒於北京狀況的危急，……上海學生立刻在當天下午四點舉行另一個會議，會議在復旦大學校舍舉行，討論成立上海學生組織，……以調和聯繫所有上海學生的活動。……復旦大學學生總代表何葆仁，被選為臨時主席。……會議中，全體學生代表一致通過成立上海學生聯盟的提案，……這便是上海學生聯合會的起源。五月九日，……上海學生舉行第二次預備會議，討論正式建立學生聯合會，……會中正式決定於五月十一日成立學生聯合會」參照陳曾燾著，張玉法譯，《五四運動在上海》，頁90-93

<sup>3</sup> 李玉階於〈上海學生響應五四愛國運動的經過〉一文中說道：「1919年我就讀於吳淞中國公學，學名鼎年字玉階（中公是革命最早的學府，國父孫公和黃興、蔡元培、於右任等前輩均是中公董事，胡適博士於中公畢業后赴美國深造，歸國后曾出任母校校長）。當五四運動發生，我被推為中國公學的學生分會會長及出席上海學生聯合會首席代表。」參見李玉階，〈上海學生響應五四愛國運動的經過〉，該文原載於《傳記文學》1977年5月號，後收入氏著，《天聲人語》（臺北：中華民國宗教哲學研究社，1987年），頁300。另根據1919年10月21日《申報》第三張〈上海學生聯合會〉記載：「十八號下午四時，上海學生聯合會總務科開會，到者八人。先由臨時副主席第二師範代表蔡祚章報告經過情形，次即選舉本屆正式職員，茲將當選者姓名錄下：正主任中國公學代表李鼎年、副

學運後數年，李玉階曾擔任上海統稅局兼財政局局長及宋子文秘書<sup>4</sup>，後又因特殊機緣毅然決然於民國 23 年辭官往陝西行道，並於歸隱華山期間著作《新境界》（原書名《新宗教哲學體系》）。該書以和子、電子論等科學觀點嘗試詮釋宇宙萬物生成原理以及儒道心性修養之關鍵所在。此舉可說是開創宗教教義科學語言化之先鋒。<sup>5</sup>民國 38 年李玉階離開西安華山而旅居上海期間，由於難辭蔣鼎文、胡宗南、丁德隆、王仲廉等將軍對當時危急情勢之殷切詢問，<sup>6</sup>於是「靜觀」數日後，於《全民日報》發表

---

主任清心實業代表馬慎餘……後更討論一切進行事宜，訂定每日下午四時至六時，為本科辦事時間……五時十分散會。」可知李玉階擔任總務部部長一職時間應在 10 月 21 日才開始上任。另根據劉文星考證，此時學聯會 5 月 8 日聯合會議時，李玉階應該擔任學聯會交際部交際員負責與罷工人士或單位進行溝通。比如李玉階自述曾負責勸諫水電工廠工人停止非理性罷工之事宜。參照劉文星，〈李玉階在滬史料拾遺〉，《天帝教教訊》期 163（1997 年 8 月），頁 66-67。

<sup>4</sup> 根據《自立晚報四十年》記載：「李先生是江蘇武進人，吳松中國公學畢業，為民國八年五四愛國運動的健將，民國十六年八月，出任上海特別勞資調節委員會主任委員，後進入國民政府財政部做事，任宋子文部長秘書，負責整理煙鹽各稅」。自立晚報報史編纂小組，《自立晚報四十年》（臺北：自立晚報，1987 年），頁 25。

<sup>5</sup> 《新境界》中大量使用圖解方式說明宇宙星系形成過程，其中對於星系地球形成後各生命體的基本組成元素及情感活動，李玉階都有其一套自成一格的論述系統。其中包括以和子論、電子論解釋民間盛傳之地獄觀念，或人身體內部靈體與肉體組成元素（比如靈魂和子構成成分為： $H^{\circ} O^{\circ}$  之精華+電質+溫度+X 特種原素。〈 $H^{\circ}$  代表氫， $O^{\circ}$  代表氧，X 代表某種性靈意識〉）之說明，基本上就當時而言，已經算是超越當時的宗教教義型態而有突破。當然《新境界》中對於目前科學界仍無法解釋之靈魂或宇宙真正形成過程所提出之見解，由於不是經由現代科學儀器實驗所得，所以說他提出的論點不能說是當代科學界所界定的科學知識，但就宗教領域中能夠大膽透過自己於華山親身修煉所得而試圖透過當時的科學概念予以解釋，這種作法應該可以視為一種宗教哲學跨領域式的身體科學性嘗試。筆者推論，李玉階之所以會有如此科學語言式之解釋立場，主要是受到五四科學精神之影響。李玉階，《新境界》（臺北縣：帝教出版社，1995 年），頁 19-20。

<sup>6</sup> 由於李玉階受命弘教西北而鎮守華山期間，便有蔣緯國、胡宗南等重要人物上山請求靜觀抗日局勢以面授軍機。因此日後凡與抗日或國家重大情事發生之際，常有官方重要人物代表登門請益。相關記載請參見郭雄藩、李旭如、李今悟等著，《上方恩深紀白雲》（臺北：帝教出版社，1996 年）。

《時勢預測》以安人心。<sup>7</sup>國民政府遷臺之後，民國 40 年李玉階又改以書生報國身份而復刊《自立晚報》<sup>8</sup>。隔年又組臺北市民營報業聯誼會於戒嚴時期鼓吹「新聞自由」。在此之後，李玉階又為爭取「新聞自由」而退出國民黨，並試圖為雷震交保而險受波及入獄。由此可見，李玉階可以說是當今鼓吹五四民主、科學精神之繼承及實踐者。本文將從李玉階對民主、科學信念之堅持作為探討五四運動對當代知識發展之實質意義，同時在李玉階面對此西方文化衝擊之反省下，如何以儒道共法的中正之道，成功地調和集權與民主運作之微妙關係，進而發揮矛盾統一之共存價值。筆者期望能在此主題研究下，透過李玉階這位跨越海峽兩岸歷史軌跡之五四知識青年，真實呈顯出中華文化母體下之臺灣價值。

### 一、上海五四運動視角下的李玉階形象

綜觀李玉階一生事蹟，我們可以發現到他在中國當代政治史、思想史、宗教史之發展上，堪稱為一傳奇性的歷史人物。之所以稱之為傳奇，乃在於李玉階一生事蹟除了觸及層面寬廣而相互交疊之外，主要是他的影響力到了現在都還是一種進行式。比如當代政治史上廣為人知的蔣中正、宋子文、胡宗南、于右任、邵力子、蔣緯國等人都跟李玉階有很特殊而鮮為人知之互動關係；<sup>9</sup>而人文思想界之胡適、王雲五、雷震、徐復觀、端木愷、王惕吾等學術教育或新聞法律之活躍人物，也都是李玉階呼籲新聞自由之際，落實三民主義理想之重要戰友之一；<sup>10</sup>至於宗教影響力方面，

<sup>7</sup> 根據《李玉階先生年譜長編》記載：「李玉階〈時勢預測〉公布後某日，雲龍至聖降臨，責其太早洩漏天機，應受天譴。此後先生受盡人事磨難，然始終問心無愧。」劉文星，《李玉階先生年譜長編》（南投：帝教出版社，2001 年），頁 174。另參見李玉階，〈靜坐須知第四講：精、氣、神之鍛鍊〉，《天帝教法華上乘正宗靜坐基礎教材》（臺北：帝教出版社，1997 年），頁 67-68。

<sup>8</sup> 劉文星，《李玉階先生年譜長編》，頁 182。

<sup>9</sup> 參見劉文星《李玉階先生年譜長編》各時期之記載。

<sup>10</sup> 比如雷震受控告而至法院受審之際，李玉階曾攜帶單位章隨時準備幫雷震作保。另外，

當今佛教界頗富盛名的成一老和尚都是當初李玉階與蔣維喬、丁福保等人所發起之「宗教徒和平建國大同盟」<sup>11</sup>之主要盟友，而在李玉階復興先天天帝教之前，他所主持之中華民國宗教哲學研究社曾定期舉辦學術演講會，而在此數百場學術演講會中，諸如當今法鼓山聖嚴法師或鵝湖創辦人王邦雄教授等人，都是李玉階所賞識而推崇之大師級人物。由此可知，李玉階之思想格局並不限於一政黨或一門派。他的開放胸襟與尋求中道太和理想一直在他的生涯中扮演著重要之角色。而此種融合諸家而敬異愛同姿態，實與他的儒學背景有密切之關係。

何以言之？首先家學方面，根據李氏家譜記載，李玉階之歷代高祖皆為清朝之進士或舉人，比如李之五世從祖申耆公為乾、嘉間江南大儒而與常州學派領袖之一劉逢祿過從甚密，學者稱養一先生；<sup>12</sup>至於李氏之母劉太夫人，溯其祖系先祖則可前推至明朝大儒劉宗周。由此可知，李玉階是在一個儒學底蘊濃厚且強烈救國意識之家庭中長大。<sup>13</sup>

---

根據〈自立晚報報史四十年〉記載：「飽受『誤傷』折磨的柳哲生，隨即向法院提起自訴，控告聯合報及徐復觀惡意誹案。本報因從頭到尾都未認定柳哲生及其家中相關人士涉及本案，並且不斷以事實及證據質疑柳家人涉案之說，所以代表新聞界出面協調這件誹謗官司，最後達成和解。柳哲生撤回告訴，報業公會舉行酒會，正式向柳哲生夫婦道歉。酒會由國民黨中央四組主任曹聖芬先生及本報董事長李玉階共同主持。」由此可知，李玉階與哲學界大師徐復觀先生的交情在當時應該就已經建立了。自立晚報報史編纂小組，《自立晚報四十年》，頁 142。

<sup>11</sup> 劉文星，《李玉階先生年譜長編》，頁 164。

<sup>12</sup> 劉文星，《李玉階先生年譜長編》，頁 69。

<sup>13</sup> 李玉階於華山修練期間，平時除了參悟三教各類經典之外，劉太夫人之身教以及親贈之劉宗周《劉子全書》可能成為李玉階一生涵養儒道精神義涵而應用於國家社會之重要經典。根據李子弋追憶父親李玉階受到祖母劉太夫人之家教訓勉時提到：「祖母經案上，放置一本《金剛經》，一部家傳的《劉子全書》。祖母家學淵源，承傳明代最後一位大儒劉宗周之心學。祖母對劉宗周的誠意、慎獨、清修、篤行有獨得之心得與卓見。祖母習作、經讀至勤，她寫得一筆靈飛經體的娟秀小楷，她習慣於隨閱讀、隨筆記，細摺在一本精緻的宣紙手卷上，《明心哲學精華》應該是祖母讀《劉子全書》、《宋明學案》的筆記，儘管經過惇聾道人天人親和轉折傳播，至少仍保存祖母『慎獨』之『涵

至於學風方面，李玉階五四運動之後轉讀中國公學<sup>14</sup>期間，實際上就是深受到于右任之啟蒙教導，而始立宋儒張載：「為天下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之志。而在此精神驅動下，1919年五四運動以致歸隱華山之前，李玉階皆以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三不老人」自稱。這就表明了李玉階的確受到孟子精神感召而胸懷治國平天下之偉大志向。因此即便李玉階歸隱華山8年之後自號為涵靜老人，但就李玉階復刊《自立晚報》初期（1954年）受到沈昌煥百般刁難而遭三度停刊之際，依然強調：「抱定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的基本態度，不怕任何威脅打擊，始終努力，但，沈昌煥的政治野心，是大家知道的。」<sup>15</sup>由此可知，李玉階即便晚年以80歲高齡創辦天帝教而毀家辦道。但是就其一生事蹟來看，他的儒家淑世精神一直沒有改變。而這樣的特質，不論是五四運動期間或是日後從政、修道、辦報乃至創辦天帝教之道路上，基本上都可在其言行軌跡中看到這種積極入世而關懷人類之風範。

在此儒學背景掌握下，我們根據李玉階自述上海五四運動之經過，便可以對他有更深一層之同情性了解。他說道：

上海學生聯合會成立大會是在公共租界靜安寺路環球學生會舉行，參加代表有80余所學校，首先通過組織規程，設會長一人，

---

養』、『省察』之教，『篤行』之『立志』、『力行』之勸的原始精神。祖母經常說：『無愧暗室』、『正大光明』、『規規矩矩做事，正正當當做人』、『對憂苦人勿樂，對悲戚人勿喜，對失意人勿驕，對盛氣人勿爭』。這些道理，都來自《劉子》的誠意、慎獨、篤行，母親每每當父親一意孤行時，就會以『如果姆媽知道，她一定會動氣』來規勸父親，就可知道父親以敬畏為孝順的常心與常行，這種種至今猶深烙在我心中。」可知《劉子全書》是李玉階先生家傳之重要典籍。參見李子弋，〈有幸福人道 才有圓滿天道〉，《天帝教教訊》期213（2001年11月），頁36。

<sup>14</sup> 民國8年五四運動後，適逢中國公學復校開課，李玉階決定由育才公學轉校至中國公學，其原因極可能與當時中國公學的革命學風有關。因為當時的孫文、于右任、黃興、邵力子等人皆為中國公學的董事。劉文星，《李玉階先生年譜長編》，頁69。

<sup>15</sup> 參見《自立晚報》，1954年9月6日-9日。

副會長一人，分設評議、執行兩部，評議部設部長一人，議定本會一應重要活動事項，交執行部執行，執行部部長由會長兼任，下設秘書室、總務部、宣傳部，當場選出復旦大學代表何葆仁為會長，南洋大學（即交通大學的前身）代表彭昕（精一）為副會長，復旦大學代表狄侃為評議部部長，瞿宣穎為秘書室主任，我為總務部部長，潘公展為宣傳部部長。<sup>16</sup>

由李玉階之描述可知，當時上海學運約有 80 餘所學校參加，而在此諸多學校代表互相推選之下，李玉階與當代著名的報人潘公展之後分別擔任上海學聯會的總務部及宣傳部部長。由此可見，當時的學聯組織基本上已經展現出知識份子對於民主觀念之初步認知。除此之外，對於上海學聯幹部處理「上海罷工」所引起之連鎖變化，學聯幹部不但不因此而慌張失措，反而都能無私地面對問題而一一解決，這也就說明了上海五四青年在學習民主制度過程中，的確展現了民主社會「理性自制」之法治精神。比如，當上海罷工運動持續幾天後，雖然學聯之呼籲獲得上海地區各工、商界之支持而紛紛自主性罷工休市，不過鑒於水、電供應乃關乎民生基本生活而不宜冒然停止之考量，由李玉階所主事之總務部（當時應該是交際部）必須設法說服水、電廠全體工人放棄罷工以維護全市正常之生活運作，於是李玉階在資源有限之情況下，連夜奔波溝通費盡唇舌，最後終能平息一波可能由學生愛國運動變質為社會暴動之危機。<sup>17</sup>

<sup>16</sup> 參見李玉階，〈上海學生響應五四愛國運動的經過〉，頁 300。

<sup>17</sup> 李玉階提到：「有一天上午，學聯會接到確實報告：『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南市閘北所有的電廠、水廠全體工人繼司機工會之後將於明天罷工。』果然如此，則全市治安將不堪設想。學聯會立即召集緊急會議，決定立刻勸導全市水電工廠工人，顧全大局停止罷工。本人身為總務部部長，責無旁貸，惟當時最感困難者為交通工具，而全市出差汽車（等於臺北的計程車）司機均遵公會決議全體罷工，迫不得已，乃向同鄉遜清郵傳部尚書盛宣懷先生的四公子恩頤借得私人汽車一輛，於晚飯後由中國公學蕭志駕車，趕往楊樹浦電廠和水廠，與兩廠工會代表懇談，告以愛國固然重要，但須顧到全市市民生活的需要，幾經努力，終於說服。繼而又分赴法租界和南市、閘北三處電廠、水廠工會苦口勸告，並以公共租界電廠、水廠工會均已同意打消罷工相告，舌敝唇焦，

第二天消息傳來，公共租界當局和北京政府的上海最高治安當局方面——淞滬護軍使——都認為學聯會這批青年深明大義，處置得當，否則全市電廠、水廠工人一經罷工，上海陷於癱瘓，治安將不堪設想。原來同情和支持我們的英國和美國總領事與公共租界治安當局面臨影響他們自身的安危，勢必改變對我們的態度，採取強硬干涉措施，其后果必然是學聯會被迫解散，使我們這場愛國運動前功盡棄。<sup>18</sup>

事實上，我們若從公共租界當局和上海最高治安當局對此次事件之反應來看，上海學聯會之理性處理而進退得當，確實獲得了北京甚至英美領事館政府層級官員之認同及嘉許。就此來看，當時上海學聯不但能夠成功地發動工商界罷工，最重要地，他們也能成功地穩定住罷工運動所可能帶來之失序危機。就這點來看，上海五四運動成功地銜接了北京學運精神，進而將民主法治精神做一次成功之展現。更難能可貴的是，就李玉階之回憶，自上海學聯成立至北京政府接受全國學生要求的這段期間，學聯的運作及理念皆與孫文或戴季陶、于右任、葉楚傖、邵力子諸先生以及國民黨政要沒有接觸，而當時共產黨也尚未有組織，因此也談不上有任何關係。也就是說，整個學運過程就是上海學生純潔清白的愛國心所使然，其中並無任何政黨之介入扇動：

在此我必須坦白聲明者，自上海學聯會成立之日起到北京政府接受全國學生的要求這段期間止，學聯會始終未與國父孫中山先生和戴季陶、于右任、葉楚傖、邵力子諸先生以及國民黨在上海的其他負責人過接觸往來，全憑一腔愛國熱心，絕無半點政治企圖；至於

---

直到天明，總算達成任務，三處工會亦均同意作罷，因而滿天風雲，頓告消散。」參見李玉階，〈上海學生響應五四愛國運動的經過〉，頁 303-304。

<sup>18</sup> 參見李玉階，〈上海學生響應五四愛國運動的經過〉，頁 303-304。

共產黨在民國八年根本尚無組織，更談不到。此所以我一再強調五四學生運動是絕對的純潔清白的原因，值得驕傲。<sup>19</sup>

當然，若我們根據日後歷史發展來看，當時活躍於五四運動之學生日後都成了當代兩岸政治界、教育界、企業界之重要人物。而根據劉文星研究李玉階之事蹟來看，五四運動之後，李玉階等學生精英之表現受到于右任、邵力子等人之賞識，因而特別經由兩位要人之引薦而見到了孫文先生。李玉階也是在孫文擔任介紹人之殊榮下正式加入中國國民黨。

加入國民黨之後，由於李玉階剛正不阿胸襟獲得諸方之肯定，23 歲時便獲聘為上海市菸酒公賣局局長。而擔任公賣局局長期間，李玉階鑒於透過商人承包公賣局稅收方式，將使大量稅收流入局長及承包商口袋而造成政府損失。鑑此，李玉階為求一改貪汙包庇之既有惡習，於是重新將每區包商該交的私款皆化私為公而大增國庫收入。隔年孫傳芳接收上海後，為求大力整頓財政，於是在友人推薦下，李玉階又同時兼任上海財政局局長。<sup>20</sup>由此可知，李玉階將五四運動期間所深信的民主、科學精神，透過現實政治之實踐場域，展現出法治社會應有之理性自制典範。而此種作為支撐民主社會健康發展的法治精神，在李玉階 1949 年渡臺後，在他主持《自立晚報》呼籲言論自由過程中，也有其一貫不變之精神展現。比如李玉階對於民主自由及人權維護方面，我們可以透過他辦報時爭取言論自由以及雷震案發生前後之應對而得以瞭解。

## 二、復刊《自立晚報》及體制內之民主改革

眾所周知，60 年代臺大哲學系事件始末，殷海光成為自由中國民主運動之歷史悲劇之一。殷海光之所以會被當時的國民黨政權不容，主要是殷海光擔任《自由中國》半月刊主筆期間，對於自由民主觀念之大力鼓吹，

<sup>19</sup> 參見李玉階，〈上海學生響應五四愛國運動的經過〉，頁 305。

<sup>20</sup> 劉文星，《李玉階先生年譜長編》，頁 73。

而此種民主思潮之提倡因有著孫文三民主義之民權主義精神作支撐，所以發刊之前期基本上皆能夠獲得有關當局之支持，而扮演著思想教育之角色。不過國民政府渡臺獲得美援後，在國共內戰未熄國家局勢仍動盪不安之際，由於《自由中國》創辦人雷震意欲組織反對黨以抨擊蔣中正尋求連任，於是在此動員戡亂政治敏感氛圍下，殷海光自然而然受到牽連而遭受免職且監控。不過在這段歷史的交會線上，李玉階作為體制內改革者，他有一段較少為人知之歷史事蹟，而這些潛存事蹟與史載內容之交叉作用，其對於未來中國社會之民主發展，應該可以提供另一種思考模式之可能。

何以言之？事實上在殷海光及雷震分別在《自由中國》發表〈反攻大陸問題〉、〈反對黨問題〉<sup>21</sup>之前，李玉階已在《自立晚報》提出〈在沒有有力反對黨之前，我們需要一張獨立性的報紙〉（1954年6月6日）之呼籲（底線為作者所加，本文以下皆同）。

近代政黨政治的民主國家，一定要有兩個強有力的政黨，一個在朝執政，一個在野反對，互相競爭，相互監督，國家才有進步。執政黨一定要以適應大眾需要的政策來迎合人心，來贏得選民的擁護，來決定下次議會改選時候的席數；反對黨則一定要針對在朝政策及設施，把握弱點，盡量抨擊批評，指責糾正，以建立在野時候人民對他們的信心，作為下次競選的政治資本，決不可用陰謀顛覆政府的企圖，以武力來奪取政權。<sup>22</sup>

此段引文乃李玉階1951年接辦《自立晚報》三年後，發表於該社社論《天聲人語》專欄上之文章。由於國民黨政府播遷來臺之後，軍政待整、上下民心不安，因此在如此氣氛詭譎人人自危的情況下，李玉階敢於社論

<sup>21</sup> 1957年8月號開始《自由中國》社論連刊為期7個月一系列「今日問題」共15篇。其中由殷海光執筆〈反攻大陸問題〉（1957年8月1日），最後一篇由雷震〈反對黨問題〉（1958年2月1日）。參見傅正主編，《自由中國》（臺北：自由中國社，1946-1960年）。

<sup>22</sup> 李玉階，〈在沒有有力反對黨之前，我們需要一張獨立性的報紙〉，《自立晚報》，1954年6月6日。

版面上提出成立「反對黨」的呼籲，實際上是不被當局歡迎而危險的。不過李玉階以知識份子特有的時代使命及他本人剛正不阿、敢言敢擔的個性，因而在此動員戡亂時期並未因此感到忌諱而有所退縮。

事實上，李玉階發表上引社論內容之前，早在 5 月底發表過〈民營報業不容歧視〉（1954 年 5 月 22 日《自立晚報》）之內容，而這篇文章內容主要是針對當時主管機關偏袒公營報社而視民營報業為地痞流氓之打壓態度提出嚴正之抗議。不過此文章一出，引起當時之公營報社《新生報》社長謝然之不滿而以〈我們怎麼辦報〉（1954 年 5 月 31 日《新生報》）回擊。當然面對謝然之公然侮辱民營報業的舉動，李玉階隔天立即發表了〈控訴謝然之〉（1954 年 6 月 1 日《自立晚報》）以為回應。一星期後，李玉階又發表長篇社論〈讀了謝然之的「我們怎麼辦報」以後〉（1954 年 6 月 7-10 日《自立晚報》）以批評這些特權者之自大跋扈，藉此重申反對黨及言論自由對於國家長遠發展之重要性。

我們體會到這幾年政府對於言論的政策已是日趨寬大，但是我們還覺得不夠，國家還沒有強有力的反對黨，政府應不僅不干涉言論自由，而應對言論自由加以積極的鼓勵。<sup>23</sup>

當然此一系列針貶時弊的言論，聽在新聞主管當局耳裡是難以被接受的。所以即便李玉階早在 1952 年春便偕同李萬居、王惕吾及范鶴岩等代表宴請沈昌煥、張彼德（當時有嚴家淦、張滋闓等部長陪同）即席商談。不過李玉階這種據理力爭的個性不但未受到沈昌煥等主管支持，反而因著為爭取新聞言論自由的堅定態度而得罪沈昌煥，<sup>24</sup>於是最後終究招致《自

<sup>23</sup> 李玉階，〈讀了謝然之的「我們怎麼辦報」以後〉，《自立晚報》，1954 年 6 月 7-10 日。

<sup>24</sup> 邱家宜根據陳國祥、祝萍等人研究成果，認為：「《自立晚報》創報比《公論報》還早兩個多月，但期間數度易主經營，剛開始的經營者顧培根（顧培根先生治喪委員會，1984）、鄭邦琨、婁子匡等都還是與國民黨關係良好的人士。1951 年 9 月開始由李玉階主持報社，擺脫立場曖昧渾沌的舊觀，一改而為自由言論的急先鋒。」可知，李玉階接任《自立晚報》之後對於臺灣言論自由的貢獻。參照邱家宜，〈戰後初期臺灣報人

立晚報》第二次被勒令停刊三個月之命運（1953年10月19日）。對此政府官僚之無情打壓，李玉階於《自立晚報》上回憶說道（1954年9月6日-9日）：

沈昌煥毫不留情，要置本報於死地，翌日仍以詆毀元首為由，於法無所依據，請以停刊三個月之嚴厲處分，提出會報通過。……本年國民大學期間，在中國公學校友會歡宴胡適之先生會上，胡先生與我談起這事，曾以老學長資格責備我不該屈於權勢，助長毀法者之氣焰，影響民主法治前途，並且一再鼓勵我，今後要拿出勇氣，爭取新聞自由、言論自由。<sup>25</sup>

作為一份民營而無政府黨派支持之報社<sup>26</sup>，在當時之現實條件來看，只要遭受政府1、2次停刊處份就極有可能產生財務危機而停業。比如呂東熹書中就曾提到李玉階在1950年代就是「民營報業聯誼會」重要人物，當時李玉階帶領當時經營相當辛苦的民營報業向官方爭取各項相關之權利。<sup>27</sup>不過就是因為如此，《自立晚報》因屢次遭受停刊而陷入嚴重之財務危機。另外邱佳宜也提到：

《自立晚報》言論雖不像《公論報》那樣激烈挑戰當局的言論尺度，但也被列在「不聽話」的名單中，並曾經三度遭停刊處分。如同其他敢言的新聞媒體，在當時的臺灣社會總是很快就經營不下去，《自立晚報》的財務日趨困窘，1959年夏天，原本與國府高層頗有淵

---

群體的多重「感知結構」，《新聞學研究》期112（2012年7月），頁151。另參照陳國祥、祝萍，《臺灣報業演進40年》（臺北：自立晚報，1987年），頁83。

<sup>25</sup> 李玉階，〈送往迎來〉，《自立晚報》，1954年9月6日-9日。

<sup>26</sup> 邱家宜〈戰後初期臺灣報人群體的多重「感知結構」〉一文中提到：「臺灣光復後從大陸來臺的報業從業人員，則多半具有黨政軍背景（但也有少數例外，其中最為人知的，是下文將會提到的雷震，標榜「無黨無派」的《自立晚報》發行人李玉階，以及到1988年報禁解除前都被禁止辦報的成舍我），對國府的向心力與忠誠度普遍很高。」邱家宜，〈戰後初期臺灣報人群體的多重「感知結構」〉，頁126。

<sup>27</sup> 呂東熹，《政媒角力下的臺灣報業》（臺北：玉山社，2010年），頁318-323。

源的社長李玉階，正式邀請著名的黨外人士吳三連投資，共同加入經營《自立晚報》。<sup>28</sup>

因此李玉階面對沈昌煥的刻意打壓，他除了設法到處跟友人借款渡過倒社危機之外，對於回應政客最好的方式，就是在義憤填膺之餘能夠繼續堅持理念而撐下去。下引〈應為真理而奮鬥〉（1954年6月11日）一社論內容，可以說是李玉階面對謝然之公然侮辱以及沈昌煥打壓的困境下，發自良心的正義吶喊：

上帝告訴我們，只有站在真理的面前，始終以不變而應萬變，是者就是是，非者就是非，善者即是善，惡者即是惡。一切須憑著良心、憑著理性，以正義的標準去判斷批評，不容許我們有絲毫的假借，些微的感情用事，昧著良知，欺騙自己，歪曲事實，顛倒黑白。

我們不要認為人盡可欺，人盡可騙，以曲為直，以直為曲；要知道公道自在人心，是非終有水落石出的時候。一個現代的國民，必須要有公是、公非、公善、公惡的基本認識，養成社會獎勵好人、打擊壞人的仗義精神、善良風氣。<sup>29</sup>

就歷史發展結果來看，李玉階這種威武不屈不畏強權的信念，日後不僅證實他的儒家精神幫助他渡過當時之倒社危機而重新站了起來。尤有甚者，我們就《自立晚報》復刊後的社論來看，李玉階並未從此害怕而妥協。相反地，我們在他社論內容中，發現他對維護民主法治及人權自由的決心是日益堅定。筆者若大致整理1953年《自立晚報》10月19日被刻意停刊，以至1958年4月27日胡適回國時大力稱讚《自立晚報》為自由民主努力之事實，我們便可發現這4年半李玉階被官僚打壓、侮辱期間，他著

<sup>28</sup> 邱家宜，〈戰後初期臺灣報人群體的多重「感知結構」〉，頁151-152。另該文主要以呂東燾之說法為依據。呂東燾，《政媒角力下的臺灣報業》，頁328。

<sup>29</sup> 李玉階，〈應為真理而奮鬥〉，《自立晚報》，1954年6月11日。

實是為民主法治之落實而奮鬥不歇。<sup>30</sup>此事蹟可由胡適的一段話以為佐證：

我好久沒有在《自由中國》上寫文章，但《自由中國》半月刊到現在還繼續存在，不但《自由中國》半月刊有言論自由，臺灣許多報刊雜誌，比諸四、五年以前，已獲得更多的言論自由。比如，夏濤聲先生的《民主潮》、李萬居先生的《公論報》、李玉階先生的《自立晚報》等，都有很獨立自由的言論。<sup>31</sup>

可想而知，胡適歸國後的這場演講文章，對於當時提倡言論自由的李玉階而言是一大鼓勵。不過即便如此，4月27日當場演講的後兩天，立法院卻以秘密審議方式通過出版法修正案而引起軒然大波。鑒於出版法修正案對於新聞言論自由之妨害，李玉階基於堅守三民主義民主自由理念，毅然決然宣布脫離國民黨，並且在《自立晚報》頭版公告欄上方特別標示：「無黨無派，獨立經營」幾個大字（1958年5月2日）<sup>32</sup>，同時在標題下，

<sup>30</sup> 四年半期間李玉階對於民主自由之呼籲不曾間斷。比如1954年復刊之後，他陸續發表諸如：〈民主自由之種子到生根的時候了〉（1954年6月18日）、〈玩弄政治者〉（1954年7月15日）、〈新聞自由在哪裡？人權保障在哪裡？〉（1954年9月18日）、〈行政院應撤銷九大禁例：由出版界、出版界自動制定公約〉、〈與王德溥部長談「法」：三論內政部制定戰時出版品九項禁律〉、〈說話與不說話的自由〉（1956年6月18日）、〈我們對法治的一貫觀點〉（1956年8月16日）、〈我們沉痛而堅決的要求出版法修正草案應予撤回〉（本社論為李玉階次子李維公所撰。1958年4月14日）等等文章。

<sup>31</sup> 胡適，《胡適演講集（三）》（臺北：遠流出版社，1988年），頁229-236。

<sup>32</sup> 張炎憲認為：「以《自立晚報》營運初期的三度遭到威權統治者停刊為例。……起於國民黨『作業疏失』而導致『自民國8年五四運動參加中國國民黨獻身革命』的黨員李玉階脫黨，更導致一份國民黨掌控的報紙在其後逐步走向『黨外』報業，這可能是國民黨始料未及的錯誤，但就臺灣報業，以及此一報業在其後發揮的輿論監督功能來說，或許可說是一個『美麗的錯誤吧』。可惜的是，這份聲明基本上出之於無法接近權力核心的失落感覺，其中還隱藏著國民黨的權力鬥爭陰影。」透過張之說法我們可以了解到李玉階的脫黨及獨立經營，確實造就了日後報業發揮輿論監督功能。參見張炎憲、曾秋美、陳朝海編著，《20世紀臺灣新文化運動與國家建構論文集》（臺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2003年）。另外，對於張炎憲文後提到李玉階是因為「無法接近權力核

李玉階特別聲明：

本人自民國八年五四學生運動參加中國國民黨獻身革命之來，不求聞達，愧無建白。來臺後曾於國民黨總歸隊時辦理登記，並參加本報直屬區分部，迨直屬區分部撤銷，而臺北市黨部未將本人納入組織同時本人亦以民國四十二年國民黨中央於法無據決議通知從政黨員臺灣省主席俞鴻鈞同志予本報以三個月之嚴厲停刊處分，打擊同志經營之新聞事業，因此本人亦無勇氣在參加基層小組，三十餘年黨籍遂此消失，從此決本無黨無派立場，在反共復國新聞崗位上，民主法治面前，繼續努力為爭取憲法賦予人民基本自由而奮鬥。<sup>33</sup>

對於立法院走回頭路的怯懦作法感到失望，李玉階以實際的脫黨行動表示他對民主法治之堅定信念。或許也是此現實環境下之必然發展結果，李玉階在這段時間與李萬居、雷震等自由派人士間的聯繫更形緊密。比如1960年雷震組織反對黨而被判入獄之前，李玉階就曾與雷震討論過組織反對黨的問題。比如《雷震全集》第一個十年之日記記載（1960年2月22日）：

李玉階來談，勸胡先生（案：胡適）組織反對黨。我勸他去說，因我已說得太多了。<sup>34</sup>

另外，1960年5月26日日記中雷震也提到：

舍我來談，告訴昨日記者吃飯，他大為宣傳，並說胡先生來鼓勵，

---

心才脫黨辦報」這個說法，我們若考量李玉階在事業輝煌騰達時願意接受師命（天德教教主蕭昌明）辭掉上海統稅局兼財政局局長等要職而至西北宏教，日後又受天命上華山修煉並祈禱抗日勝利等事蹟來看，張炎憲之說法可能是一面之詞而有待商榷。

<sup>33</sup> 李玉階，《自立晚報》，1958年5月2日。

<sup>34</sup> 雷震著，傅正主編，《第一個十年（八）》，《雷震全集》第40集（臺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頁255。

新黨之成立可使國民黨改革，並云我們每日開會。

李玉階來談，他提出三點：趁熱打鐵，不可太緩。第二、最好胡先生出來，次為我（筆者按：雷震），再次為李萬居。吳三連顧慮太多。第三、為組織型態。成立新黨，對民青兩黨採聯盟方式。<sup>35</sup>

由以上兩日記內容便可以知道，李玉階與雷震關係並非泛泛之交而是親密戰友。不過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即便李玉階與雷震兩人皆認為有立刻成立反對黨的共識。但是不同的是，李玉階明確表明須有胡適來組黨而非雷震。而事實上李玉階這樣的主張對於雷震而言是不能苟同的。

上午十時許勻田與濤聲來談，勻田謂如要聯合發表宣言，須由胡先生（案：胡適）領導，才有效力，否則各自講話。我（按：雷震）本不贊同由胡先生出來領導的，至是打算同去會胡先生。電話打通，胡先生約我們即去，在他那裡吃飯。<sup>36</sup>

由此可以看出，在 1960 年初組黨初期，我們基本上可以看出兩派不同的聲音。一派是由雷震主導的激進式反對黨，另一派則是希望由胡適來領導的體制內反對黨（因蔣中正曾經允許胡適組織反對黨）。其中李玉階與齊世英或許勻田等人則是屬於支持知識份子領導之體制內改革派。於是基於路線之不同，李玉階最後並沒有接受雷震之邀請而加入新組之中國民主黨。當然也是這個原因，雷震案發生之際，李玉階等人雖也曾經被內部提報為約談對象，但最終還是能夠避過牢獄之災。<sup>37</sup>

雷震欲邀國內外自由派人士合組反對黨，如先生（案：李玉階）和齊世英、高玉樹、朱文伯、李萬居等亦在受邀之列。先生與齊世英

<sup>35</sup> 雷震著，傅正主編，《第一個十年（八）》，頁 316。

<sup>36</sup> 雷震著，傅正主編，《第一個十年（八）》，頁 234。

<sup>37</sup> 根據雷震 1959 年 3 月 3 日日記記載，雷震遭陳懷琪投書偽造文書而於至法院應訊，李玉階夠義氣地願意主動幫忙做保。「今日到法院者有濤聲、李玉階、周棄子等，社中馬、傅、金三人均去，惟恐交保，故曰《民主潮》帶圖章去，如需二人，李玉階願參加，盛情可感也。」雷震著，傅正主編，《第一個十年（八）》，頁 42。

等主張籌組一個以知識份子為主流的政黨，雷震等較激進人士主張成立一草根性政黨。由於彼此理念不合，先生決定退出。<sup>38</sup>

由以上簡述之歷史發展來看，李玉階與雷震兩種革新派性質剛好可以與日本明治維新時期所謂「白色陽明學」以及「紅色陽明學」之發展相比擬。所謂「白色陽明學」主要由東京大學教授井上哲次郎等知識份子所主導，而此派系主張引進德國思想而進行體制內革新；另一方面，「紅色陽明學」主要由一些強調社會運動流血革命份子所組成，所以他們的行為較為偏激且草根性。因此，這些紅色陽明學代表者諸如幸德秋水或山川均（日本共產黨）等社會運動者雖然一時都能反映部分社會人心之需求，但最後因手段或言論過於偏激而被判入獄或殺害。而此種結果在當時臺灣社會民主發展進程而言，亦有相類似之處。因此，就社會長期發展脈絡來看，此種以反對為主軸之社會運動有其推動社會前進之積極意義，但就人類命運正反辯證朝向至善和平之長遠目標而言，白色陽明學式的體制內改革還是代表著安定社會往前發展之主軸力量。

於是筆者順著這樣的思維形式，以白色陽明學角度看待李玉階作為體制內改革的知識份子，檢視他於雷震案發後發表「今天的國是問題」之內容，繼而透過此五篇社論以作為對照 1957 年殷海光、雷震於《自由中國》所發表「今日問題」之十五篇社論。<sup>39</sup>相信我們可以從中看出李玉階本人在此段歷史中所持有的應世態度。

《自由中國》雜誌的言論問題，不在本文的範圍之內；但有一點必須說明的，就是胡氏雖對該刊的言論未盡同意；對雷震個人之支

<sup>38</sup> 劉文星，《李玉階先生年譜長編》，頁 234。另請參考李維剛，〈我父母親的天道與人道〉，《首席使者涵靜老人伉儷九秩雙慶專輯》（臺北：天帝教始院，1990 年），頁 148。

<sup>39</sup> 此主題由 5 篇文章所組成，並由《自立晚報》連續 15 天分篇刊出。其中標題為〈第一篇：為什麼要寫這篇專文〉、〈第二篇：過去的錯誤在那裏？〉、〈第三篇：當前的問題有那些？〉、〈第四篇：今後我們該怎麼辦？〉、〈第五篇：結語〉。李玉階，《天聲人語》（臺北：帝教出版社，2006 年），頁 346-355。

持，卻始終如一。就在雷震發生之初，他對外籍記者的談話，也是強調雷震為一反共愛國者。可是胡適果真支持雷震？從他赴美出席學術會議返國之後的情況來看，顯又未必。這就毋怪有人要認為胡氏對雷震的態度，正和他作為社會賢達或諍友立場對政府所持的態度若相符合。<sup>40</sup>

關於雷震案的歷史定位問題，目前已經有許瑞浩、蘇瑞鏘等權威性研究成果，筆者無須贅言。不過眾所周知，事件當時的主客觀因素糾葛下的歷史真相，往往不是歷史非參與者所能盡知而斷定，因此筆者必須站在現象學的立場，從各個角度去呈顯事物的全貌以逼近真理掌握之可能。所以我們除了從歷史悲劇中去感懷雷震等民主先行者的貢獻之外，最重要的是，我們如何能從此悲情中走出以開創積極和諧的臺灣社會，或許這才是對雷震等民主先行者的禮讚。基於此立場，筆者選擇以哲學多元包容態度，試著看待五、六十年代臺灣知識份子彼此留下的不同足跡。

基於以上理由，筆者從另一個側面摘錄了李玉階〈第二篇：過去的錯誤在那裏？〉之社論內容以供參考。在這篇文章中，李玉階顯然對雷震案有其深刻之瞭解，其中他對胡適看待雷震言論之半保留態度，正也是反映李玉階本人的態度。不過，相同的是，不論胡適或李玉階本人，兩者在情感上都是與雷震站在同一陣線的。當然，這篇社論李玉階不打算直接討論雷震，其中要旨主要鎖定在胡適面對雷震案之明哲保身態度，李玉階希望藉此說明知識份子應該具有不屈的氣節及承擔。也就是說，即便胡適是李玉階中國公學的老學長，而且李玉階也明確表態支持胡適組黨，不過雷震案後，李玉階對於胡適擔任中研院院長卻不能更堅定地為自由人權理念而向當權者提出諍言，關於這點李玉階是感到失望的。因此他據此結論地說道：

我們自然不能說胡適博士處境之所以如此，全係因為他擔任官職之

---

<sup>40</sup> 李玉階，《天聲人語》（臺北：帝教出版社，2006年），頁347。

故。事實上他在必要時的保持緘默，雖可能有其不得已的苦衷，都多少要受傳統「明哲」思想的影響。因此我們今天可以這樣肯定的說：社會賢達是不適宜擔任官職的。<sup>41</sup>

由此可知，李玉階認為知識份子對於傳統道德與民主運作之間的關係是必須清楚認知的。李玉階認為社會賢達之使命便是秉持社會良心為國家諍言。〈第四篇：今後我們該怎麼辦？〉中，他引用史學家胡秋原之說法，認為智識份子應該發揮：一是創造文化的功能；二是政治上立法創制保護人民的功能；三是應付危機解決疑難的任務。針對此三項功能，李玉階在該篇第四項針對智識份子部分所提出之第二小項建議中指出：黨派應該退出學校，解除限制學術、思想及言論自由。

我們要鄭重建議當局，應使黨派退出學校。而且使任何具有政治影響力量的團體也不得在學校中活動。讓作為知識份子的教授們，在學術思想上有自由，在言論報國方面有充分表達的機會。老實說，凡是有學問有修養的人，在今天都不會甘作民族罪人，不致有造亂的思想的。他們同時也明白今天的大局只有在維持現狀中改變現狀方不致損及整體。<sup>42</sup>

由以上列舉之簡例來看，當今臺灣社會能夠有如此自由之學術及新聞言論自由，除了與雷震等人之反對革新有關之外，由李玉階等人所代表之體制內革新，確實亦敵亦友地鞭策著國民政府走向正確改革之路。這樣的臺灣民主奇蹟，象徵著中國五四運動時期，青年愛國理性自制精神之具體典範。同時李玉階能夠在五四運動以及經營自立晚報期間成功地完成他體制內改革使命，正是他體現中正之道至公至正、不偏不倚的實踐結果。至於李玉階為何能夠有此毅力及膽識去承擔此項沉重任務，事實上此種精神之蘊釀，實與 1937-1946 年間潛居華山窮究天人之學有關。

---

<sup>41</sup> 李玉階，《天聲人語》（臺北：帝教出版社，2006年），頁349。

<sup>42</sup> 李玉階，《天聲人語》（臺北：帝教出版社，2006年），頁380。

### 三、宗教教義科學化之嘗試

當我們從上節討論新聞自由及支持成立反對黨的革新立場來看，我們實在很難相信李玉階復刊《自立晚報》以前，卻有一段完全不同於報人性質的人生角色。而這個角色是由他 30 歲時（1930 年）皈依天德教教主蕭昌明，並於 34 歲決定辭官行道西北開始。這段旅秦期間（1934-1946 年），李玉階與當時佛教界有名的太虛老和尚一樣，平常除用心於弘揚宗教教務之外，對於當時之抗日戰爭及國家局勢亦相當關心。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李玉階在西安事件之中所扮演的角色。根據李文星研究，李玉階於 10 月 27 日便預先告知弟子：

「西安將有劫難，願與諸子加強培養正氣，化戾致祥。」時諸子未解其義。（中略）十六日，馮欽哉軍長偕車處處長許海仙走訪先生（案：李玉階），（中略）事變次日晚，許海仙往謁先生謂：『馮軍長欽哉頃自大荔來電話，詢問事變情形，並囑請示應付機宜。』對曰：「蔣委員長一身繫國家民族之安危存亡，張、楊不明國情，不識大體，犯上作亂，決難成事。現能左右局勢，拯救委座者，厥為欽哉一人。精忠報國，在此一舉，望速轉達，把握時機。」翌日，許專程赴大荔報告。按當時情況，馮軍長駐防大荔。如奉張、楊命令，立即出兵，控制潼關，則中央樊松甫軍即無法長驅入關。然馮軍長在大荔按兵不動七日，張、楊迭令催促，終不表態。直至樊軍及董釗所部廿八師進駐華州，中央大軍雲集，馮軍方開至三河口一帶，於是強弱之勢判分。<sup>43</sup>

若此研究所言事蹟句句屬實，那麼此時李玉階應該已經具有宗教界所說的預言能力。<sup>44</sup>所以當現實發生一些超乎凡人所能預測或改變之事件

<sup>43</sup> 劉文星，《李玉階先生年譜長編》，頁 105-106。

<sup>44</sup> 至於馮欽哉軍長為何會如此信賴李玉階，這可能與李玉階已具有宗教之預知能力有關。比如劉文星記載：「關中大旱，棉迫需雨，陝府主席邵力子憂心如焚，苦無計施。適先生有事往訪，言談之間，獲悉此事，遂訓令諸子誦誥禱雨。自八月十一日（六月

時，此種具有特殊能力的修行者反而成為影響當事件之重要關鍵人物。因為試想當時馮欽哉軍長若未接受李玉階建議而奉張、楊命令直接帶兵入關，那麼最後勢必導致國共內戰。而一旦國共內戰或蔣介石被殺的話，日後的抗日成功是否會實現也很難說。<sup>45</sup>因此從此角度來看，李玉階在此西安事件中可說是間接影響了事件之結果。

至於學者可能會懷疑以上事例應屬於宗教學研究範圍，且只能視為一個孤證而不足為信。鑑此，筆者雖自知此等神秘主義式內容應該存而不論而無須涉及，但就詮釋學之主體交涉客觀化要求下，以更開放胸襟去全方位看待事物反而是必須的。因此筆者認為有必要再舉一簡例，說明李玉階當時確實是以類似軍師角色，隨機提供軍情或國際局勢預測給來訪之胡宗南等國家要人：

風陵渡敵軍（日軍）晝夜砲轟潼關，威脅隴海軍運，潼河鐵橋被毀，東西交通阻斷。其時敵軍進逼信陽，羅山吃緊，胡軍團長宗南所部奉命東開，星夜增援，路局奉令限期修復路軌，無奈風陵渡遙望潼關，目標顯明，敵方一見行動，便即砲擊，路局急迫，無計可施，乃派長安車務分段段長，兼車站運輸司令張英仲，與警務分段王段長儉，上山懇求導師妙現神通。導師公忠體國，興然上殿，靜參片時，遂告曰：「已蒙 上帝垂恩，今晚子刻，濃霧大起，隱蔽目標，可速準備材料，及時興修」來者信之，（中略）翌日，華陰車站盧站長專足來告，是夜，山下果如師所言起霧，潼河鐵橋賴以修復，兵車絡繹東行，幸未貽誤戎機。<sup>46</sup>

---

廿五日）禱始，迄十三日竟大雨傾盆，兩日始晴，大旱遂解。十五日，開導師訓練班閉關圓滿，邵主席親來致詞，猶稱道不置，顧語先生曰：『神驗、神妙，此科學之所不能解決者也。』」劉文星，《李玉階先生年譜長編》，頁 103。

<sup>45</sup> 據劉文星研究：李玉階在西安事變期間的祈禱文為「蔣委員長平安」以及「不要內戰」。劉文星，《李玉階先生年譜長編》，頁 106。

<sup>46</sup> 參見郭雄藩、李旭如、李今悟等著，《上方恩深紀白雲》，頁 25。

對於李玉階祈禱降霧以助國軍修橋運兵之事，不久便傳到西北王胡宗南的耳邊。於是有一天胡宗南將軍巡視華陰之際，主動透過李縣長之安排而於華嶽玉泉院與李玉階見面。至此之後，李玉階依約「每於靜觀所得，輒撰擬時勢預測，分析長江、黃河、沿海一帶各地敵軍之動態，與夫國際情勢之變化，隨函送供胡總司令之參考，以踐前約。」<sup>47</sup>而胡宗南對於李玉階所提供之時勢分析，亦有重要之信函回覆如下：

先生游心物外，冥契玄中，心靈與造化參通，精神合天地交感，凡所啟示，均有端倪，且先生以方外之人，九棄塵俗，而乃惓懷國家民族，忠蓋不渝，非特儕輩所難求，及古今方外史乘中，亦所僅見。宗南與先生道雖不同，情無二致。<sup>48</sup>

除了以上事蹟之外，《上方恩深紀白雲》記載了不少當時重要之軍政人物至西安或上華山訪問李玉階的經過（包括蔣緯國先生），然由於此內容與本文要旨無直接關係，筆者茲不再贅述。不過由此事實看來，李玉階在當時確實是一位愛國且具有靜觀能力而受到各方敬重的修行者。於是在此背景資料掌握下，我們便可以發現李玉階從五四運動開始，歷經上海財稅局局長以至隱居華山，事實上在李玉階內心依然存在著戰亂中國的一種悲憫之心。<sup>49</sup>而這種宗教家的仁德之心，完全表現在他試圖透過宇宙真理之闡揚，以求天人大同理想實現之宗教哲學體系建構之上：

<sup>47</sup> 郭雄藩、李旭如、李今悟等著，《上方恩深紀白雲》，頁 32。

<sup>48</sup> 郭雄藩、李旭如、李今悟等著，《上方恩深紀白雲》，頁 32。

<sup>49</sup> 對於李玉階在西北傳教期間的事蹟，可由陝西省議會議長王宗山、副議長李夢彪給李玉階的臨別贈言大致得知：「玉階先生，道號涵靜老人，志存悲憫，道學宏通，以大無畏之精神，拯斯民之陷溺，旅居吾秦十又二年，毀家創教，奔走秦隴，設立宗教哲學研究社暨紅心字會，致力宗教革新，從事社會救濟，泊於抗戰前五日棄官挈眷，潛隱華山，讀書養氣，靜究真理，七年有餘，著述《新宗教哲學思想體系》一書，順應時潮，創訂獨立自主、天人合一、超越時代之科學新宗教思想，主張心物協調、聖凡平等，達成宗教、世界、天人三期大同，融合諸家，獨標新義，嘯傲煙霞，隨機吟詠，或寓意精微，或憂時衛道，迺經門下，彙輯名《清虛集》，潛移默化，發人深思，近復創辦《紅心月刊》，闡明五大建設，立論公正，取材廣博，堪為西北綜合性唯一之月刊。」李玉階，《天聲人語》（臺北：中華民國宗教哲學研究社，1987年），頁 297-98。

上太白山探訪師伯雲龍至聖，乃蒙傳達 帝旨：「翌夏浩劫將興，國難當頭，命極初（案：李玉階之道名）應于夏曆六月朔日前棄官挈眷，潛居華山白雲峰下，長期祈禱，看守西北門戶<sup>50</sup>，以應天心。」爰於民國廿六年七月二日蘆溝橋事變之前五日，遵命辭官攜眷，隱居華岳，（中略）古洞靜幽，上接清虛之炁，溝通天人文化，下貫涵靜之體，闡明宇宙真理，揭發形成宇宙天體之始源，心（和子）物（電子）相配一元二用宇宙本體之由來，與夫生命之究竟、精神之寄托、奮鬥之階段、世界之歸途，依科學之理論分章究討詳加說明，開未來學術之先河，創空前宗教之新義，導人類努力之正路，求天人大同理想之實現。<sup>51</sup>

李玉階認為宇宙本體是由心（和子）物（電子）相配之一元二用原理以形成宇宙萬物。因此李玉階據此參照科學觀點以分章說明生命之究竟、精神之寄托、奮鬥之階段、世界之歸途等內容。<sup>52</sup>李玉階希望透過當時最新之科學語言，提供世人對宇宙人生有新一層認識，繼而創造出積極樂觀之奮鬥人生觀。至於李玉階之宇宙、生命觀及修煉相關論述是何種哲學型態，此有待進一步專文討論及檢證。不過在此筆者要強調的是，單就李玉階於華山所著《新境界》一書內容來看，此種以科學語言闡述宇宙人生究竟之詮釋手法，雖然相較於胡適或杜威實證主義所謂「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等等透過實驗證明之科學方法有一大段距離，不過誠如李玉階《新境界·緒論》所言：

<sup>50</sup> 至於李玉階所言之看守西北門戶所指為何？此大致可參照《上方恩深紀白雲》所載李玉階於華山期間之事蹟可以明確得知。

<sup>51</sup> 李玉階，《新境界》，頁 7-8。

<sup>52</sup> 一般人對傳統宗教教義之認知，基本上都認為其宗教教義內容不是顯現為宗派祖師修持之宇宙人生描述、就是人生道德實踐之行為勸化或者更多是以神秘境界之描述以鼓勵信徒朝向彼岸樂土之追求，至於李玉階選擇以當時最新之科學語言以解釋宇宙人生之存在本質，這種作法即便在當代國際社會而言仍屬少見。所以李玉階奉天命駐守華山期間所著《新境界》一書內容，可以說是非常特殊之論述型態。

如何運用智慧使「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的精神科學與現代自然科學長期合流發展，如何配以有形軀體與無形靈界媒介貫通，促使「形而上者謂之道與形而下者謂之器」互相協調，亦惟在善能保握科學與哲學之相配原理與自身之修持工夫。<sup>53</sup>

由此可知，李玉階本人也相當清楚，他所提出之論點並非是現代物理科學所定義之科學。他強調《新境界》所闡發之各類論點，皆是透過個人修持而對於形而上之精神科學以及形而下之自然科學進行統合協調而成。因此就此來看，李玉階即便受到五四科學精神感召，試圖使用西方科學語詞對於形上知識，諸如神、靈魂、天等概念進行解說，但是就研究方法上，他不選擇以物理實驗方式，而是回到心性修持以求得宇宙人生真理的中國哲學工夫實踐法。所以說李玉階的宗教科學化觀點，是一種精神物質相互辯證自我體證之生命體驗理論。因此嚴格來說，李玉階的宗教科學化嘗試不是當代物理科學式的科學，而是透過靜坐自我修煉體證的體驗型生命科學。而此種嘗試可以說是五四民主、科學思潮影響至宗教教義科學化之外溢效果。而其中生命實踐哲學扮演著重要的調和角色。

於是在此思維脈絡掌握下，我們必須清楚李玉階所持的哲學觀點為何？尤其清末民初西方哲學大量導入中國之際，唯心、唯物觀點一直是個爭論不休而未獲解決的難題。當面對此時代課題所帶來國家發展路線爭議，李玉階以個人修為及對儒釋道經典之掌握，他認為宇宙之根本存在既然是和子（靈）與電子（肉），<sup>54</sup>那麼心與物應該是一個本體之兩種作用，所以是一元二用的。

作者不敏，以為吾人如在唯心唯物或心物並行各種思想之外，而要認識宇宙間一切自然現象或瞭解世界事物，先須確定一定的立場，

<sup>53</sup> 李玉階，《新境界》前揭書，頁 3-4。

<sup>54</sup> 李玉階所言之電子是構成物質肉體之最小單位，其與物理科學的電子概念雖有形式概念之雷同，但並非全然等同。

把握宇宙本體再來說明世界事物，即不致再陷入思想錯誤。作者在民國三十三年曾於拙作「新宗教哲學思想體系」中強調心物一元二用是宇宙的本體，確定心物一元二用的立場，認定離開了心物一元二用，便不能說明世界形形色色。故曰：宇宙的本體，絕不是唯神的、唯心的、唯物的或心物並行的，而是心物一元二用論的，惟有心物一元二用論是心物之爭的初步答案。<sup>55</sup>

就李玉階而言，所謂唯神、唯心或唯物之論都是偏執於一方而有所不足。李玉階強調心物一元二用論才是心物之爭的初步答案。而唯有達到此種思想上之辯證統一認識，最終才能達到：「開未來學術之先河，創空前宗教之新義，導人類努力之正路，求天人大同理想之實現」目標。職是之故，李玉階為了呼應上述說法，他在《新境界》緒論中便總結式地對於上帝概念進行不同於各宗教之科學語言式定義：

所謂「最後之神」，即是本教立教教主大宇宙至高無上之主宰——上帝，亦即儒教所謂「齋戒沐浴以事上帝」之上帝；道教敬崇之玉皇大帝；耶教信仰之上帝；回教禮拜之真主——上帝。惟本教立教教主上帝實為御統全宇宙和子——性靈之唯一主宰，因上帝具有特種鐳力以操縱電力故也。就是說：上帝為維持宇宙自然律之最高執行者，具有無窮盡之能量，施予各太陽系熱能與光，藉之維繫全宇宙和子——性靈之生生不息。蓋宇宙整個生動現象，本為無量數之和子與電子統一調和構成之空間，和子因受異引律之支配出入於任何物體之內，電子由于同引律之關係而結成陰靜之物體。在此自然界生化不息，精神物質同樣不滅之循環過程中，上帝於自然與物質之間自有運用媒介自然與物質之權威，並指揮逐級神媒施用「壓」「挾」之神能力，此為極初靜居深山參悟宇宙境界的心得。<sup>56</sup>

<sup>55</sup> 李玉階，《新境界》，頁130。

<sup>56</sup> 李玉階，《新境界》，頁5-6。

在這段敘述中，李玉階首先於《新境界》「電子論」中說明「電子僅能表示宇宙中一切自然現象中之一面，即係陰性的、靜態的、被動的、自然的、機械的、無生機的，宇宙間若僅有電子而無和子，即呈最單純的自然現象（僅有光、氣及水），即動植礦物均無法產生。」<sup>57</sup>除此之外，他在「和子論」中又進一步提出：「宇宙間構成物質之另一種最終成分為「和子」，此種原素瀰漫於大空之間，在人體中即是道家之所謂「性靈」；佛家之所謂「阿賴耶識」；耶回二教之所謂「靈魂」；在動物中即是生命；在礦植物中即是生機。換言之，和子即是代表宇宙一切現象中之屬於陽性的、主動的、自由的、自覺的原素。」<sup>58</sup>藉由以上兩論對「電子」、「和子」之存在性質說明，李玉階在此基礎下明確指出天帝教所說之上帝「為維持宇宙自然律之最高執行者，具有無窮盡之能量，施予各太陽系熱能與光，藉之維繫全宇宙和子—性靈之生生不息」。

另外，就李玉階而言，此維護宇宙性靈和子生生不息之上帝即是「儒教所謂『齋戒沐浴以事上帝』之上帝；道教敬崇之玉皇大帝；耶教信仰之上帝；回教禮拜之真主—上帝。」如此一來，如果客觀上真如李玉階所言一般，各教所說之上帝就是天帝教所說之上帝，那麼我們不僅可以透過天帝教之上帝觀，增加我們對上帝的科學語言式認識之外，同時藉由李玉階「第三神論」<sup>59</sup>對上帝之詮釋，多少可以幫助各大宗教減少教義上之衝突，而消彌殘暴不仁的宗教戰爭。這即是李玉階試圖透過上帝信仰而達到「聖凡大同→世界大同→天人大同」三同理想之要旨所在。

而這樣的三同理想不僅可呼籲孫文天下為公、世界大同之廣度，同時也能在孫文思想基礎下由政治領域擴充到全體生命之生活。由此可知，即便李玉階在此宗教修煉階段有其異於常人之生活精彩，但是就他在華山修煉期間，仍然試圖透過科學語言以解決人類心物對立，或宗教教義衝突所

<sup>57</sup> 李玉階，《新境界》，頁 15。

<sup>58</sup> 李玉階，《新境界》，頁 15-16。

<sup>59</sup> 李玉階，《新境界》，頁 100-101。

造成之苦難，我們便可以從中看出李玉階對五四民主、科學精神實踐之強烈要求。

#### 四、亂世的定海神針：中正之道與人類之未來

經由上述二、三節之討論，我們大致可以看出李玉階兩種對比鮮明之生平事蹟與其五四精神之傳承有關。不過學者或許會進一步提問，在此民主、科學精神之繼承主軸下，李玉階思想中難道沒有一種母體文化作用以支持他在民主科學實踐中達到辯證平衡。如果有的話這個母體文化核心本質為何？針對此問題，筆者認為這答案可由李玉階在《自立晚報》發表的兩段社論內容看出端倪：

梅貽琦先生在前引「集大成的孔子」文中所述：「自歐風東漸，海禁大開，當時因科學落後，船堅砲利，不如外人」算來大致已經是六十年前事。但六十年後「德先生」與「賽先生」雖早已前來我國，而政治之未上軌道，科學之落於人後，猶為不容否認的事實。<sup>60</sup>

李玉階認為自五四運動時期所提倡之「德先生」與「賽先生」雖然早已在中國生根發芽，但是 40 年後，此種政治之民主、科學之發展仍然落後外國而未上正軌。鑑此，李玉階於下引文中嚴正地呼籲，無論「薄古厚今」、「厚古薄今」之立場皆非正法，唯有孔子的「中庸之道」才是面對當今亂世之定海神針。

一年一度以吃「冷豬肉」為己足的先生們，今後似應轉而從發揚傳統文化，重整固有道德方面多下功夫；同樣一味崇洋媚外，數典忘祖，也不可能使我們的國家得救，開口閉口「月亮是外國的好」的先生們，今後似亦必須注意但取別人之長，以補自己之短。……「薄古厚今」、「厚古薄今」，均非所宜。有之，其唯孔子的「中庸之道」乎？<sup>61</sup>

<sup>60</sup> 李玉階，《天聲人語》（臺北：帝教出版社，2006年），頁283。

<sup>61</sup> 李玉階，《天聲人語》（臺北：帝教出版社，2006年），頁282-283。

由此可知，李玉階即便受五四薰陶而支持西方民主科學價值，但是他認為當今社會開放接受西方價值觀之餘，還是要以孔子的「中庸之道」作為衡量事物輕重或行為實踐之依據所在。也就是說，我們根據《論語·子路》：「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之說法，李玉階此處所論之中庸之道，就是指涉不偏不移適得其所的處事態度，所以就此意義而言，我們也可稱中庸之道為中正之道。因為偏於激進或懦弱都不是面對問題、解決問題的良好態度，唯有在國家發展上不卑不亢地「取別人之長，以補自己之短」，這才是中國知識份子社會菁英應該持有的態度。基於此種中正之道<sup>62</sup>之肯認，李玉階除了於華山提倡心物一元二用論作為統合心物對立思想原則之外，就政治觀點上，他也是主張以競賽代替鬥爭，以體制內改革取代體制外叛變之辯證發展模式。這個政治立場自從李玉階受雲龍至聖之命，決定下山移居蓬萊仙島（臺灣）領接新天命之前便已經確立：

任何宗教，實具有利他精神，乃若干不同之中，絕對一致者。基於此，吾人乃產生過問政治之動機，始提出和平建國之要求，始確定對政治、對經濟、對國內外問題之認識「基礎」。基於此，吾人始堅持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美國與蘇聯，國民黨與共產黨，應和平共處，以競賽代鬥爭，而不應鼓勵戰禍，擴大殺機。基於此，吾人始側重人民與國家之利益，而不以本盟之前途為先務，吾人可以承認本盟為政黨，但絕不強調黨性，可以在民主前提下參加選舉，但絕不漠視盟外之賢能。<sup>63</sup>

<sup>62</sup> 何謂中正之道？根據筆者近年對中國儒道經典研究成果可簡單歸納如下：一、就事理而言為至公至正。二、就心思而言為不偏不倚。三、就氣質而言為剛正不阿。四、就工夫而言為中靜形正。五、就境界而言為中道太和。參照黃崇修，〈《太極圖說》中正概念之工夫實踐還原——以《管子》「中靜形正」言說為核心〉，《國立臺灣大學哲學論評》期 56（2018 年 10 月），頁 37-86。

<sup>63</sup> 李玉階，〈「宗教徒和平建國大同盟」宣言〉，《申報》，1947 年 5 月 29 日。

這篇文稿是李玉階下華山南歸上海之際所發起之「宗教徒和平建國大同盟」宣言內容。當時李玉階提出：「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美國與蘇聯，國民黨與共產黨，應和平共處，以競賽代鬥爭，而不應鼓勵戰禍，擴大殺機」。此內容不僅表現出一位宗教徒渴求國家安定所做的和平主義似呼籲，其更呈顯出李玉階對宇宙本體之體認，發為國家民族命運所提出之懇切建言。李玉階認為，如果每一個人或國家若無法實踐中正之道而選擇極端對立攻擊，那麼其最終結果恐怕只會導致國家分裂，甚至世界毀滅之人類悲劇。而這樣的觀點不僅出現於國共內戰時期〈時勢預測〉一文中，甚至 1960 年雷震被捕下獄，當時知識份子為明哲保身而呈現意志消沉之氛圍下，李玉階仍然以其靜觀所得而於〈今天的國事問題〉卷頭語中提到這樣的憂患觀點<sup>64</sup>：

老實的說：靜觀天象，默察世局，自由極權兩個世界由於主義思想制度生活方式之不同，根本不易獲得本質上的調和，儘管口頭高唱和平共存不願戰爭，而大勢所趨，各走極端，事實上已經演變到最後關頭，終有一天，非由戰爭不能解決世界的問題，人類的命運。……人類空前浩劫（世界核子戰爭）立刻降臨，整個世界殆將毀滅，同歸於盡。<sup>65</sup>

由此看來，李玉階所擔心的是，當時國際社會中，分別由美國與蘇聯所代表之自由與極權兩大強權漸漸有擁核自重而互相叫囂趨勢，而此種非理性之衝突現象若未獲得適當調和平衡，就邏輯推論上的確可能發生一時失控而導致核戰爆發之空前浩劫。因此，李玉階在此美蘇軍武競賽國際對

<sup>64</sup> 當然李玉階此種悲天憫人胸懷所作之靜觀預測也不是保證全然獲得眾人之理解。比如李玉階曾對他的「時事預測」所遭受的誤解提出一些說明：「我二十年來，本已放棄政治生涯，與世無爭。由於我在預測中強調天命仍在 蔣公，竟然有人懷疑到我另有政治作用，我的動機與苦心，不為人諒。不過，事實勝於雄辯，蔣總統復職四年有餘，我根本不曾求過一官半職，至今依然是一個平民身份。」李玉階，《天聲人語》（臺北：帝教出版社，2006 年），頁 346。

<sup>65</sup> 李玉階，《天聲人語》（臺北：帝教出版社，2006 年），頁 326。

立日益嚴重情況下，決定再以八十歲高齡復興先天天帝教，以為化延世界核戰毀滅浩劫而努力。至於其實際行動除了宗教式祈禱迴向之外，他在平常傳法佈道過程中，一再強調《新境界》教義「和」的狀態在宇宙人生之重要性：

萬流歸源，宇宙天理之真象在一「和」字。大而言之，旋和系之運行不得其「和」，即成混沌；物質與自然不得其「和」，即無生機；小而言之，人生之電子與和子不得其「和」，即有死亡；人類心理感應不得其「和」，即生仇；社會秩序不得其「和」，即有變亂；國際不得其「和」，即生戰爭。推而衍之，科學與哲學不得其「和」，即無真理；道德與知識不得其「和」，即無和平；天人不得其「和」，即無大同。故天地之基，聖凡之道，立國之本在一「和」字。「亂」為「和」之對稱。<sup>66</sup>

和是一切生命維繫及活動順遂之根本原則。小自個人乃至社會、國家皆因獲得其和而有生命及安定。若國際間不能和諧，那麼就會亂，而此人心之亂就是李玉階所擔心的第三次世界核子大戰之主要原因。

「和」「亂」對照表如下：

和→奮鬥→世界大同→自由神靈→聖凡平等

亂→侵略→戰亂循環→偶然和子→輪迴顛倒<sup>67</sup>

李玉階慎重提出上述對照關係之後，隨即強調地說道：「往者已矣，今後人類惟有加強奮鬥，把握真理，撥亂反正（和），以自救救人救世。方足以免除劫運及痛苦之增長，而求大同之實現。」於是在此論述脈絡下，我們也可以看到李玉階嘗試由中國傳統哲學角度，進一步說明吾人若要真正體現「和」之境界，其根本方法即是體現中國文化「太極之道」，因為太極天道本體是包羅萬象和容一切，所以可以達到使萬事萬物陰陽調和共

<sup>66</sup> 李玉階，《新境界》，頁 111。

<sup>67</sup> 李玉階，《新境界》，頁 112。

生之目的：

是故道者，和也，和力也，即銜接媒介聯繫親和之真理也。道之本體，在中國古代哲學中有太極，在化學上有氫氧二氣，在電學上有所謂陰陽性電。太極之初，為一團無極之氣象，氫氧化合而成水素，故萬象萬物，莫不由水而成。所謂道者，乃形而上之物。然此形而上之物，固仍為實質的，且在人類本體之中，而與天地相和合。故一切物質之動靜，皆有道意。此道意即生機也，亦即「和」是也。凡一切獨生之物，絕不能生長，皆須和容對象，始成為生物。是故大道包羅萬象，和容一切，是為道之本體。<sup>68</sup>

引文中李玉階以「太極之初，為一團無極之氣象，氫氧化合而成水素，故萬象萬物，莫不由水而成」，說明了中國古代哲學中太極生化萬物並以水為萬象萬物之本的觀點。且不論此中說法是否合乎當今科學觀點，單就李玉階論述形式來看，此處說法明顯地援用宋明理學開山祖周敦頤《太極圖說》「無極而太極，太極生陰陽二儀」之說。因此就此而言，李玉階所謂：「道者，和也，和力也」之說，或許我們也可以視其為周敦頤《通書·師》：「中者，和也，中節也」之義理轉化而成。於是在此視野觀照下，我們也看到李玉階對於宋明儒學同情性了解之一面。<sup>69</sup>

由上可知，當我們掌握到李玉階確實受到五四民主科學精神強烈影響之餘，同時又發現他對於中國傳統儒家文化之時代性轉化特質。而此特質讓李玉階成功地實踐民主、科學精神之際，他又透過切身之修行經驗，重新對於民族文化底蘊找到了更堅實之支撐力量。也就是說，李玉階首先以《新境界》科學精神打破宗教迷信屏障，繼而落實孫文民生主義之理念；之後他又以《自立晚報》社論平臺，於臺灣動員戡亂時期奮力爭取新聞言

<sup>68</sup> 李玉階，《新境界》，頁 117。

<sup>69</sup> 參見黃崇修，〈儒道天人思想發展脈絡下的繼承及超越——涵靜老人「昊天虛無大道自然無為心法」初探〉，《政大華人宗教》期 5（2015 年 8 月），頁 77-112。

論自由，以為孫文民權主義理念發展樹立典範；最後他又以中國哲學中正之道調合民生主義與民權主義發展中的內在衝突，進而以此作為調和國家社會穩定發展之重要原則，最後期望能夠達到民族共和之和平相處目標。此種用心，相較於當時上海五四運動諸公之人生事蹟而言，李玉階的一生可以說是孫文三民主義思想之忠實實踐及革新者。所以他在《新境界》緒論中說道：

本教教義理論是積極向上樂觀奮鬥的，旨在認識宇宙人生的新境界，如何使人開拓生存競爭的思想領域，共躋世界於和平大同之境。茲將有關「政治性」和「世界觀」之要點剖論於後：

一、戰事曠日持久，人心疲弊，若再以消極的悲觀的宗教思想灌輸常人腦際，則必使民氣消沈，意志頹唐，民族勢必演成天然淘汰，惟有認識宇宙，人生必須樂觀自強，認清時代環境，為光明正義而與一切惡魔抗爭，先求自身之生存，再謀大眾之生存，故曰：「向自己奮鬥」。推而廣之，即是救國家救民族救世界，此為民族自決。

二、「殺身成仁，捨生取義」固為民族美德；但「尚武精神」與「浩然正氣」之發揚光大，尚須寄托於宗教信仰。平時明瞭生命之來源，勘透生死關頭，發揮民族固有德性，砥礪獻身殉國精神，臨危自能深明大義，視死如歸，死後靈氣（和子）清明，必為逍遙自在之「自由神」，永存不朽，此為民族精神。

三、聖智庸愚各等人類，品質雖有區別，不過僅為電子構成肉體質量之不同，而其異引和子之來源則一，可謂先天本來平等。人生一切環境並非天生與天賦而來，必須自植自奮自愛而得。所謂「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亦即所謂帝王公侯伯子男民乃是人為的，反之，人人皆可獲得平等之地位，於此足以證明上述之理論，莫不吻合。吾人須知古往今來宇宙間惟有「行」字方能創造一切，方能革新進化。「人之生也為行而生」，務須改變沉滯不進的態度，打破徬徨煩悶的心理，效法天體的運行，積極「向天奮鬥」，

自強不息，循著宇宙間自然的真理，篤踐力行，潛心學養，雙修性命，以期永生永存，求得聖凡平等最後之目的，此為民權（人權）之始終。

四、由於「向自己奮鬥」之結果，進而倡導戰後世界共「向自然界奮鬥」。蓋大戰之後，民生凋敝，百廢待舉，故宜由國際經濟合作，集中力量，分配資源，互助開發，增加生產，積極建設，務期妥善運用自然，使能地盡其利，物盡其用，漸次恢復和平秩序；否則人心耽於安樂，忽視自然，故須激勵振奮，注重勞工神聖。蓋以「工」字而論，其上一畫為自然，下一畫為物質，中一筆為人力，合成工字。所以凡具有共生共存之心，能為大眾謀福利，而向自然奮鬥者，便是自然與物質間之「神媒」，即為人間之「神媒」，是故名曰：「勞工神聖」，此係民生之真義。<sup>70</sup>

由以上引文內容剖析，我們發現到李玉階對於孫文三民主義思想即便有所傳承，但是就整個論述格局來看，李玉階進一步將三民主義從政治意義拉高層級至宇宙全體生命上來談。也就是說，民族精神就是每個人向「自己奮鬥」而有機會成為「自由神」；而民權或人權之歸宿則是透過個人不斷地性命雙修「向天奮鬥」而求得永生永存之聖凡平等目的；最後所謂民生主義之宇宙意義在李玉階而言當不僅是果腹求飽而言，他認為凡是「向自然奮鬥者」可成為調和自然與物質之「神媒」，而社會階層之勞工就如同「媒介之神」一樣，可以調和推動著社會發展而成就其「勞工神聖」之人生價值所在。

至於上述李玉階的人生態度及格局，一直到他去世之前都未嘗有所改變。因為在他擔任天帝教首任首席使者之第 11 年，他以 91 歲高齡二度寫信給鄧小平，隨後他又將此二封信一字不漏地刊登於臺灣的報刊頭條。信件內容，句句為兩岸人民福祉，人類和平之未來懇切期盼，而其書信內容

---

<sup>70</sup> 李玉階，《新境界》，頁 8-11。

提到「一國二制」模式無法適用於中華民國的斷言或預測，到了今天還是可以反映著臺灣政界或人民普遍的聲音。李玉階為了中華民族能夠成為世界和平的締造者，因此在第二封信中再度向鄧小平提議：「以『中庸之道』適時參考臺灣經驗，擷取三民主義重要之精神及精華，真正塑造出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長此以往，方可造就空前未有的世界性大中國」<sup>71</sup>，於是李玉階在中庸之道及三民主義精華為前提之呼籲下，最後提議兩岸可以學習東西德模式，雙方商議修改國號及憲法，例如成立類似以心物一元二用互相依存之「中華邦聯」辯證和諧共存模式<sup>72</sup>：

世界政治局勢或偶有影響中國兩岸和平統一的步調，但是深信一切仍操之於我，所有外在影響因素亦將可豁然消失。人民的眼睛是雪亮而晶瑩，在先生領導之下，慎謀能斷，運籌帷幄，一念之間，明智抉擇，中共果能毅然放手乾坤一擲，大勢所趨，必然天與人歸，萬方擁護，將見「一個國家一個主義」，兩岸自然走向和平統一，在合乎中國社會特性合情合理的條件下，重新制訂新憲法，重立新國號（例如中華邦聯），共建一個民主、法治、均富、和平、繁榮合乎天意人願的新中國（中略），迎接即將來到「中國人的廿一世紀」，時不我與，機不可失，全民福祉，繫於一念，千秋大業，實唯賴之。民族幸甚！國家幸甚！世界幸甚！<sup>73</sup>

## 結論

本文以李玉階的儒學家風及他在五四運動時期的愛國事蹟作為文章

<sup>71</sup> 李玉階致信鄧小平之後，不久便將此兩封信刊於國內《中央日報》、《聯合報》、《中國時報》等各大報，以及《美國世界日報》、《巴黎歐洲日報》等報刊。比如《中國時報》1993年2月15日。

<sup>72</sup> 參見黃崇修，〈三民主義基礎下的中華邦聯構想——李玉階先生寄給鄧小平先生的二封信談起〉，收入劉碧蓉編，《傳承與創新——紀念國父孫中山先生 150 歲誕辰》（下冊）（臺北：國立國父紀念館，2016年），頁 261-298。

<sup>73</sup> 《中國時報》，1993年2月15日。

開端。在這段五四學運期間，李玉階因擔任上海學聯總務部部長，所以必須處理罷工活動之正常運作及秩序，因此對於當時上海水廠、電廠工會也相繼響應罷工之訴求，李玉階以成熟而理性的態度連夜與各工會幹部溝通，從而成功平息了一場可能導致上海市癱瘓而學運變質之危機。對於李玉階之處理得當，幾個月後讓他獲得于右任及邵力子之引薦而見到了孫文並加入了國民黨。

由於李玉階受到孫文的鼓勵而加入國民黨，這使得他日後對孫文之三民主義有更堅實之感情信仰。這可由他上海辭官而最後奉天命至華山修持所著《新境界》書寫形式窺其一二。因為李玉階有別於一般修行者之作法，他大量引用科學知識，並以和子論、電子論建構起宇宙人生意義及人生奮鬥方向，而其心物一元二用論則更成為化解當時思想界唯心、唯物紛爭的一種圓融理論。李玉階認為宇宙間存在著陰—陽；動—靜；和子—電子等兩兩對立調和的關係，他認為知識份子應該體認此中庸之道而努力扮演其中調和媒介萬物之角色，此為李玉階繼承民生主義之科學精神後，進一步透過宇宙生命之認識，以彰顯出民生主義中勞工神聖使命之價值所在。

除此之外，李玉階奉天命至蓬萊仙島之後，隨即改變其華山修煉參悟天機的身份，再轉回以儒家知識報國姿態，從事復刊《自立晚報》以提倡人權法治及新聞自由。期間，李玉階每為報業之出版自由得罪上層而慘遭兩次停刊之命運，不過李玉階並未因遭受此重大打壓而臣服於權貴，於是1958年5月李玉階宣布退出國民黨並以無黨無派姿態繼續為民主自由而發聲。尤其李玉階認為一個健全的民主國家必須有一強大反對黨監督執政，如此才能促進國家邁向民主政治之正途。因此他除了在社論中提倡成立反對黨之外，也在與雷震幾次重要聚會時，建議雷震支持胡適出面組織反對黨以健全民主政治。不過最後由於雷震選擇較激進反動形式組織反對黨，這使得李玉階與雷震關係漸行漸遠，當然正也是因為李玉階堅持心物一元二用論下之中正觀點，這使得他這種體制內的改革形式，沒有在雷震案時受到過大之波及。

由此可知，李玉階一生事蹟即便精彩多元，但是我們可以看到的是，他在每個生命翻轉過程中，一貫地持守中正之道以作為面對詭譎變化的定海神針。尤其他在美蘇兩強擁核自重互相叫囂的冷戰時期，他為了避免人類再度面臨新的世界大戰而人心不安，於是他毅然決然地以 80 歲高齡復興先天天帝教以祈挽救浩劫。李玉階認為世界人心若未得其和而對立衝突，那麼最終必會演變成國際間的對立繼而發生核子戰爭，因此李玉階平時除了帶領天帝教信徒日日祈禱迴向以化延世界核戰浩劫之外，每於適當之演講場合，他必以人類前途宇宙生靈之和諧為主軸，闡明和諧真理以及人生之意義。

此種愛國心切永不停歇之悲天憫人情懷，除可視其為李玉階五四民主科學精神外擴展現之外，同時也可以說是他貫通天人所得，而運用中正之道以求其和的具體表現。尤其在他去世前二年寫給鄧小平的二封信所述：「以中庸之道適時參考臺灣經驗，擷取三民主義重要之精神及精華，真正塑造出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長此以往，方可造就空前未有的世界性大中國」便是他超越了兩岸意識形態黨派紛爭，轉以全人類福祉為依歸進而提出順應時代潮流之肺腑建言。至於李玉階 20 年前信中提倡效仿東西德模式，共同商議更改國號為中華邦聯之建言。如今看來，對於目前中華民國面臨之國際局勢而言似乎過於理想化，不過對於李玉階信中透露出法理臺獨無路，一國兩制不通的現實臺灣情境而言，李玉階當初試圖透過三民主義政治理想以開創兩岸和平契機，進而達致世界和平之倡議，此就學術思想建構角度來看，何嘗不是李玉階以中正之道為當今兩岸和平，甚至世界和平所留下的最後一條太和之路。

## 文獻徵引

- 自立晚報報史編纂小組。《自立晚報四十年》。臺北：自立晚報，1987年。
- 呂東熹。《政媒角力下的臺灣報業》。臺北：玉山社，2010年。
- 李子弋。〈有幸福人道 才有圓滿天道〉。《天帝教教訊》期 213，2011年 11月，請補頁數。
- 李玉階。〈靜坐須知第四講：精、氣、神的鍛鍊〉，《天帝教法華上乘正宗 靜坐基礎教材》。臺北：帝教出版社，1997年，頁 67-68。
- 。〈讀了謝然之的「我們怎麼辦報」以後〉。《自立晚報》，1954年 6月 7-10日。
- 。《天聲人語》。臺北：宗教哲學研究社，1987年。
- 。《天聲人語》。臺北：帝教出版社，2006年。
- 。〈「宗教徒和平建國大同盟」宣言〉。《申報》，1947年 5月 29日。
- 。〈在沒有有力反對黨之前，我們需要一張獨立性的報紙〉。《自立晚報》，1954年 6月 6日。
- 。〈應為真理而奮鬥〉。《自立晚報》，1954年 6月 11日。
- 。《新境界》。南投：帝教出版社，1981年。
- 郭雄藩、李旭如、李今悟等著。《上方恩深紀白雲》。臺北：帝教出版社，1996年。
- 李維剛。〈我父母親的天道與人道〉，收入《首席使者涵靜老人伉儷九秩 雙慶專輯》。臺北：天帝教始院，1990年，請補頁數。
- 周策縱著，楊默夫譯。《五四運動史》。臺北：龍田出版社，1981年。
- 邱家宜。〈戰後初期臺灣報人群體的多重「感知結構」〉。《新聞學研究》期 112，2012年 7月，頁 117-158。
- 胡適。《胡適演講集（三）》。臺北：遠流出版社，1988年。
- 張炎憲、曾秋美、陳朝海編著。《20世紀臺灣新文化運動與國家建構論文集》。臺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2003年。
- 陳國祥、祝萍。《臺灣報業演進 40年》。臺北：自立晚報，1987年。

- 陳曾燾著，張玉法譯。《五四運動在上海》（臺北：經世書局，1981年）。
- 傅正主編。《自由中國》。臺北：自由中國社，1957年。
- 黃崇修。〈《太極圖說》「中正」概念之工夫實踐還原——以《管子》中靜形正言說為核心〉。《國立臺灣大學哲學論評》期 56，2018年10月，頁 39-87。
- 黃崇修。〈三民主義基礎下的中華邦聯構想——李玉階先生寄給鄧小平先生的二封信談起〉。收入劉碧蓉編。《傳承與創新——紀念國父孫中山先生 150 歲誕辰》（下冊），臺北：國立國父紀念館，2016年，頁 261-298。
- 。〈儒道天人思想發展脈絡下的繼承及超越——涵靜老人「昊天虛無大道自然無為心法」初探〉。《政大華人宗教》期 5，2015年8月，頁 77-112。
- 雷震著，傅正主編。《雷震全集》。臺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
- 劉文星。〈李玉階在滬史料拾遺〉。《天帝教教訊》期 163，1997年8月，頁 66-67。
- 。《李玉階先生年譜長編》。南投：帝教出版社，2001年。



## **Dao of Moderation in May 4th Democratic and Scientific Innovation—On Li Yu-Jie’s Practice of Democracy and Freedom and of Religion and Science**

Chung-hsiu Huang\*

### Abstract

This study probes into the four periods of Li Yu-Jie’s life, when he participated in the May 4th Movement, when he practiced austerities on Mount Hua, when he resumed the publication of *Independence Evening Post*, and when he founded the The Lord of Universe Church (Tiandi Teachings). It will first verify Li’s attitude towards the progression of student movement while serving as a cadre for May 4th Movement. It will then put in comparison Li’s theory on mind-body unitary dual-function, which he proposed when practicing austerities on Mount Hua, and Li’s thoughts on the harmonious balance between spirit and materials in his attempts to resolve the opposition between democracy and totalitarianism as the publisher of *Independence Evening Post*. It will also closely examine Li’s practice of both humanity and natural laws after he founded The Lord of Universe Church at the age of eighty. This study argues that Li holds the Dao of Moderation, which is the core of Chinese Confucianism and Daoism, as the unshakable principle to conduct oneself in society and puts it into practice himself all his life.

---

\* Associate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Received June 11, 2019; last revised September 08, 2019; accepted September 25 2019